

DOI:10.16624/j.cnki.11-3844/d.2024.02.003

怀念田居俭先生

刘维芳

惊悉田居俭先生病逝的噩耗，心中久久不能平静。田先生是我学术上的领路人，我也被他称为“小友”。在与先生近20年的交往中，他在学术上曾给予我悉心的指导和谆谆的教诲，使我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田先生其人

田居俭先生1935年1月生于吉林双辽，1959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并留校任教。1975年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曾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及《历史研究》主编，1992年调任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兼《当代中国史研究》主编。曾任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学术

委员会顾问，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田先生出生之时，日本帝国主义已霸占白山黑水。他自幼背井离乡，跟随父辈漂泊在外，1949年回到双辽，1950年，就读双辽中学。中学时代，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校图书馆的几乎所有藏书，为后来深造文史奠定了初步基础。1955年，他作为双辽中学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考入东北当时唯一的综合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历史系，是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东北人民大学时任校长是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1959年毕业后，田先生留系任教，跟随历史学家金景芳学习。其间，一边听吕先生给学生讲课，一边系统熟悉先秦群经诸子和有关史籍。田先生

说：金先生曾告诉我，先秦史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不论你日后研究哪一段，不懂先秦史是很难深入下去的。田先生回忆道：“金先生常用朱熹的诗《读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来启发、教导我攻读先秦史，置身中国学术的‘源头活水’，为以后从事历史研究夯实基础”。田先生教学科研工作刚刚起步之时，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当时无法进行正常教学和写作，他便集中精力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主要是学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这一时期对经典著作的研读，为日后继续研究历史磨砺了理论武器。

1974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管的《历史研究》杂志复刊，需要从一些高校历史系借调一批教师参与编辑工作，先生是其中一员。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创刊，《历史研究》并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田先生从编辑室副主任岗位先后走上《历史研究》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兼《历史研究》主编的岗位。“由于审稿、选稿和编稿的需要，特别是防止工作中出现遗珠之憾”，他逼迫自己努力扩大知识面，“不仅要熟悉中国古代的各个断代，还要熟悉自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国近代史”。1992年，他调到当代中国研究所，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

对郭沫若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推动中国史学发展

的杰出贡献，田先生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郭沫若经历了旧中国的死亡，更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是中国旧史学的批判继承者，更是中国新史学的缔造弘扬者。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旧史学的终结和新史学的开端，是以郭沫若这位史学大师为标志的。田先生还认为，郭沫若不仅因其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发凡起例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河，被公认为近代史学除旧布新的一代宗师，而且还因其有一批独领风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力著，而被时人和后人尊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泰斗。史学工作者过去、现在和未来之所以要学习郭沫若，是因为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历史的正确方向和首创精神，已经成为造就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一面旗帜。

田先生认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要真正掌握社会发展的“大道”，就必须先去研究蕴含社会发展“大道”的历史。因为历史学能给人智慧和知识，使人遇事能参照前人的成败得失，深谋远虑，明辨



1994年10月，田居俭在英国伦敦北郊海格特公墓马克思墓前

是非，从而或法或戒，决定行止。所以，历代不同阶级的有识之士，都呼吁社会特别是执政者“尊史”。在人类社会诸多的“道”中，最“大”者莫过于治国安邦了。为此，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呼吁要重视历史学习。1999年2月，他在《光明日报》发表《论学史》一文。文中不仅论述了各级领导干部为什么要学习历史，而且还向他们提出了如何学习历史的建议。这篇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当天早间新闻节目里播发了消息。2002年3月，《光明日报》约他撰写《再论学史》，该文进一步阐述了学习历史的重要意义，论述了学习历史知识、借鉴历史经验、增长历史智慧的重要性，希望各级领导干部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为基础，结合工作实际，做到推陈出新，古为今用。这两篇文章都被《新华文摘》转载。《论学史》还获得了1999年的“五个一工程”奖。2013年5月，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三论学史》，重点论述了学习党史、国史的重要意义。文中指出：学习党史、国史，有益于实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前仆后继不懈追求的中国梦。

田先生在主编《历史研究》期间，还大力倡导历史学的新学科、新领域、新视角，努力促进历史学的繁荣。1986年，史学界召开新时期第一次社会史研讨会，《历史研究》是发起单位之一。1987年第一期《历史研究》刊发一组社会史研究的文章，他以“本刊评论员”名义撰文推荐。文章的题目借用了恩格斯的一句话：“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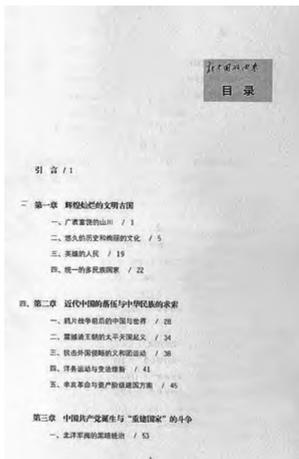
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人民日报》和《新华文摘》相继加以转载，在史学界和理论界产生了积极反响。他在文章中引用马克思的话：“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这种“深入”，应该包括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通史”应重在“通”字，应包括“当代社会史”在内。因为无论从中国通史的一个断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角度审视，还是从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并将长期经历的一个社会形态（社会主义）角度审视，当代社会史都是社会通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认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社会史研究的复兴改变了以往历史研究中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是其延伸和拓展）、经济史、文化史三分天下的单调格局，社会史成了百花齐放的史苑中一枝引人注目的奇葩。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任务不是为社会建设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提供化解思路和谋求对策，而是为社会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理论支撑，属于基础研究。用当代社会史改进和完善以往国史研究中当代经济史、当代政治史和当代文化史三足鼎立的格局，既是国史研究和国史学科建设题中应有之义，又是推进国史研究和国史学科建设的有效之举。

田先生一生著述丰富，代表性作品有专著《李后主新传》《李煜传》《乱世风云——五代十国》《春泥集》《当代人与当代史探研》《新中国的由来》，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49年卷》《旌勇里国

史讲座第1辑》《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政治前提与制度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等。

初识田先生

初识田先生始于2004年，当年7月，我博士毕业后到当代所工作。所里安排他为我们新入职的同志做入所教育。他选取了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作为讲授内容。他手里拿着的那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密密地夹着书签。可见，这套选集是他平时不知反复研读过多少遍的。在讲授之前，他说明了选择这篇文章的原因：“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便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并借以检验和发展唯物史观。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马克思所写的文章，几乎没有一篇不是由这个理论起了作用的。特别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书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十分出色的例子’”。他谈道：当时，在法国研究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废除共和、复辟帝制的著作，影响最大的有两部：一部是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另一部是蒲鲁东的《政变》。由于唯心史观的束缚，前者只是对政变主人公的个人暴力行为作了尖刻的斥责，而将政变本身描绘成了偶然性的晴空霹雳；后者虽然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对政变的历史说明又成了对政变主人公的历史辩护。马克思则革故鼎新，用唯物史观



田居俭撰写的《新中国的由来》

剖析这个通过偶然性表现出的必然性历史事件，论证了“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个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他还谈到法国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特点是高度分散，彼此隔离，势单力薄，自己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于是便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乞求别人来代表自己。波拿巴正是利用法国小农阶级这种致命弱点，实现“行政支配社会”的。在这次讲座中，先生系统讲授了唯物史观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指导意义，指出：强调历史研究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是就其科学的、完整的历史观与方法论而言，并非要一味株守其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结论；强调历史研究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是因为迄今为止还不曾发现任何历史观可以同它分庭抗礼或将它取而代之。

田先生的讲解给人以醍醐灌顶之感，原来“十分难啃”的马恩经典原著也逐渐变得可爱可亲起来。后来，在先生的推荐

下，我们室的同志们大都买了多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等书籍，系统研读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田先生给予的指导

入所的最初几年，田先生还返聘在我们研究室工作。本着加快每位年轻科研人员成长的初衷，所里给新入职的年轻人都配备了一名资深前辈作为学术指导老师，田先生负责指导我。我进入当代所最初撰写的两篇学术论文，都得益于田先生的指导。

《新中国建立初期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一文的最初选题是在先生的启发下形成的。由于此前学术积累有限，在文章选什么题目时常常感到困惑，每每这时，我会去找他聊聊，听听他的建议。每次去找田先生，他无论手头工作再忙都会放下，坐下来耐心听我诉说，悉心给我指点。有一次我又就选什么题目的问题向他请教，他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建设方面，应该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同时还提到了毛泽东和陈云曾说过的两段话。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说：“现在准备随军南下的五万三千个干部，对于不久将要被我们占领的极其广大的新地区来说，是很不够用的，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陈云曾说：“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在上述思路启发下，我完成了这篇论文的初稿。初稿完成的当

天上午，我就将它交给田先生，并怀着忐忑的心情坐在办公室里等待回复。过了几个小时，他敲门叫我过去，略带欣喜地说：基本成功。同时，他指出文章还需要进一步修改的方面，并嘱咐我：文章写出来一定要有一些“亮点”或“画龙点睛”之笔，文章要让人读来感觉是“一气呵成”。田先生的上述教导我一直铭记在心，并在治学过程中时时以此为参照提醒自己。该文后来在《当代中国史研究》发表，并收到读者的反馈——《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一文的一点补充意见》，反馈文章随后也被杂志发表。当年的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全文转载了该文。拿到转载样刊后，我第一时间去办公室向田先生汇报。他也十分高兴，并勉励我继续努力。

另外一篇发表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上的题为《毛泽东关于党的自我净化思想及其启示》的学术论文，也离不开田先生的指导。这篇文章在选题确定之时，我就有点儿没把握，一方面是因为有关毛泽东党的建设方面的研究资料浩如烟海，定这个题目是否能写出新意，另一方面是此题目太大，以我当时的学术能力，不知能否驾驭得了。带着上述困惑，我去找了田先生。他听了题目后说：这个题目可以写。我又继续谈了这篇文章的结构，也得到了他的肯定。这给了我继续写作的动力和信心。文章写完后，我请田先生审读。他审稿十分仔细和认真。读完这篇文章，他将批注过的“花脸稿”给我，并说：小刘，我觉得你以后可以独立撰写论文了。我明

白这句话蕴含的深意。因为过去我给田先生拿去的文章，他感觉都是“半成品”，而这次已经基本可以叫作“成品”了。

后来，田先生又带领我们研究室申报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研究”这两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当时，年近80高龄的田先生亲自挂帅，带着我们室全体同志，从课题主题的确定、大纲的构思、申报书的论证，到课题获批后目录的起草、文稿的撰写，再到初稿完成后的反复修改和最终定稿。其间，他还多次召开课题组全体会议，带着大家讨论大纲和书稿，反复打磨，体现了老一辈史学家对工作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崇高的精神风范。

在治学方面，田先生对说得最多的有两点：一是“良史工文”，二是“治学要有精品意识”。上述两点也是他一生坚守和践行的学术操守。田先生多次谈到，好的文章应该是理论、史料和文章的完美结合，“良史莫不工文”，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是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努力学习古今中外史学名家和大家的精品力作，不断从中吸取写作营养，才能使自己成为“工文”的“良史”。田先生觉得好的文章文笔应该是：朴素自然，简洁流畅，清新活泼，引人入胜。“善序事，辩而不华，质而不俚。”良史工文，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磨练一副好文笔，这是历代史家必备的基本功。当代史学工作



田居俭

者也不例外。田先生还多次对我说，治学要有精品意识。他以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和史学家顾炎武的《日知录》为例，告诉我：这部读书札记是作者用大半生时间和精力写出的，被誉为“负经世之志，著资治之书”，问世300多年来始终被学术界尊为精品，以至成为清一代文史大家如方苞、戴震等一再疏正论辩的“显学”。虽是一部倾注大量心血精练而成的巨著，但顾氏为该书所写自序却只有短短的61个字：“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东吴顾炎武。”倘若减掉书名来源和作者籍贯姓名所占的几个字，则仅余46个字，真是精练得不能再精练了。先生还以此书为例，专门发表了《治学也需要精品意识》一文，指出：顾炎武毕生提倡务实求真、去芜存菁的学风，反对治学中的蜻蜓点水和沽名钓誉现象。他把追名逐利、草率自刻文集的人斥之为“失足落井”，把不

辨良莠、盲目为这类文集作序斥之为“落井下石”，更鄙视投机取巧、粗制滥造，甚至变相攫取前人学术成果的劣迹。

虽然这么多年我距离先生所提出的治学目标还十分遥远，估计此生也未可及，但先生的教诲令我终身难忘，并作为日常治学的指导。

与田先生最后的交往

我与田先生始终保持着联系。2018年夏季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小刘，给你打这个电话，我下了很大决心，且思考了很久。”原来是让我帮他定期收取一下在单位的期刊及信件。我欣然接受了这个托付，并告诉他：这个对我只是举手之劳，您不用那么客气。先生却说：“我知道你们年轻人都很忙，所以考虑再三才给你打了这个电话。”并嘱咐我，你觉得有用的资料就直接留下。田先生这一世非到必要时不求人，能自己办的都尽量自己办。此后，凡是给田先生寄到单位的信件书刊等都由我代收。受此委托，我一般定期会打电话汇报一段时间收到的期刊书籍等，有重要的也给送去，同时探望田先生。

第一次去田先生家送书大约是2019年春季。当时，他怕我找不到家门，专门请夫人在小区门口等我，为我引路。进到家，印象最深的是满屋书籍。客厅整个被书籍包裹，加上书房里的图书，家里差不多一半以上的空间被图书占据。田先生的书房名为“春泥斋”，是撷取龚自珍《乙

亥杂诗》名联“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中的“春泥”二字，为读书和写作的斗室命名，用以自勉。田先生的藏书主要是文史哲类的，古今中外无所不包。我带着疑惑问他：“这些书您都读完了吗？”他说，有一部分精读过，有一部分是概览过。田先生渊博的学识离不开这些书籍的滋养。

2020年是当代所建所30周年，所里计划采访一批老同志，其中就有田先生。当我将此信息告诉他时，可以看出他很高兴，但又有些为难，主要是担心自己的身体吃不消。后来当我再次联系他时，他说出了顾虑：要接受这样的采访需要事前做十分充分的准备，而自觉精力有限，恐难完成。如果敷衍了事，又有违为人治学原则。考虑到他的顾虑，我说只需要漫谈式的，不需要太多的准备，如果身体状态不好，可以去他家采访。令人遗憾的是，后续还是因为田先生身体原因，没能完成这次采访。

再后来就是疫情的那几年，由于无法登门探望，我只能给田先生家打电话，表达惦念和问候。最后一次打电话时，是田先生的夫人刘老师接的，先生自己接电话已经比较费劲了。

回忆与田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不是吾师，胜似吾师”。田先生在我学术成长上的教诲和提携，他高贵的品格、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似一盏明灯，激励着我在学术的道路上不断前行。（责任编辑 王兵）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